

◆ 儿女情长

不灭的灯盏

欧阳健子

上了大学。当我拿着安徽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时，母亲喜极而泣。

母亲曾在1989年秋天随我一起去过一次安徽师大所在的芜湖市。我陪她走遍了师大美丽的校园，欣赏了赭山公园和镜湖公园秀丽的风景和一年一度的菊花展。当母亲在我宿舍里看到我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《芜湖日报》《安庆日报》等报刊杂志上的作品时，看到我被聘任为师大广播站学生编辑和校报学生记者证件时，看到我用稿费给她和父亲买的芜湖特产时，她笑得那么开心而灿烂。她把我买的东西送给左右邻居。芜湖是母亲一辈子跑得最远的城市，她在那里看到了城市的高楼大厦，看到了城里人的生活，看到了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的一群天之骄子的青春背影。母亲在芜湖几日，可以说是她一生最快乐的时光。手牵手散步时，母亲教育我如何做人做事的话，至今一直影响着我。她曾告诫我以后不管当老师还是当干部，都要实实在在地做好份内的事情。母亲说，你是穷孩子出身，求学又吃了不少苦，不能忘根忘本，不要嫌贫爱富，对穷苦人

家要有同情心，相信好心有好报。记得我送母亲回家登上长途客车时，她眼睛湿润，一只手擦拭着眼睛，另一只手向我久久挥动着，那离别的情景让我日后时时想起。

我大学毕业在一所中学教书三年后，被调到市政府部门从事行政工作，二十多年来无论是一般干部还是现在当任机关一把手，面对我所处的岗位和工作服务的对象，我始终记着母亲那些朴素的话语。它象我读书时用过的一盏油灯，闪着朴素的光，照亮着我的人生。2019年5月我被评为全国渔政执法先进个人，受到农业农村部的表彰，并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。我想，若母亲九泉之下有知，一定会为儿子的进步感到欣慰的。

那年冬天母亲突然得了脑梗，我请了合肥的专家来桐城给母亲会诊，但还是没有能挽救她六十五岁的生命。母亲去世那天，我正在离家五十公里外的一家国有企业召开破产职工座谈会。听取职工对公司破产安置的意见建议。兄嫂打电话给我说：赶快回家，妈妈不行了。我当时根本不相信。我和妻儿赶到

老家时，远远就听到哭声和鞭炮声。我跌跌撞撞跑到妈妈房间时，只见母亲已安详地躺在门板上，按当地农村的风俗，母亲脸上蒙上了白色毛巾，冰凉的手上捏着儿女们给的上路钱。想到母亲为我辛苦一辈子，我竟然没有给她尽孝送终，一下子情不自禁地扑到母亲身上号啕大哭。都说儿女是母亲身上的一块肉，心有灵犀，但一定是她怕影响我的工作，不让我有心灵感应吧。

母亲出殡那天，一场大雪满天飘飞。我想，那片片大朵的雪花，也许是母亲留在世间飘扬的白发。天空中飘舞着巨大而洁白的雪花，覆盖了我们恸哭的声音，覆盖住那口鲜红的棺材。也就是那天，家人在整理母亲遗物时，在床单被子下发现有整整六千元现金，那一定是母亲省吃俭用的钱。

睹物思人，我们兄弟姐妹们一个个失声痛哭起来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透过那些雪花，我看到了母爱的光，那光足以融化雪山。



◆ 流年碎影

接应

黄骏骑



山乡 李海波 摄

作。只见女社员猫着腰，银镰飞舞，一镰一镰噌地向前突进，如流星一般，动作麻利，稻把子齐刷刷地倒下。眨眼间，姑娘、媳妇、婶子们追波逐浪，如云彩般飘乎乎移向前去，一下子把我这个“男子汉”孤零零地甩在身后。那情景真像陷入泥里的老牛，蠢笨不堪。我窘极了，暗暗地恨自己：也有一双手，为什么割得这么慢？头顶上的

烈日依旧不依不饶地烧灼着一切，汗水垂在鼻尖、发梢，模糊了双眼。我全然顾不上这些，奋力追赶，还是被无边的稻浪狼狈地围在大田中间。这场面，在大田畈上要多尴尬有多尴尬！

休息的时间到了，相继割到了田头的妇女围坐在田间的树底下，喝茶聊天。已累得实在挥不动镰刀的我，几乎绝望了。我眼巴巴望了一

眼，赶紧低下头继续割稻。割着割着，忽见有人在我的对面割了过来，只听到镰刀割稻时发出的“嗖嗖”的声音，只有背影和连连倒下的稻把子。不一会儿，我们接上了头。原来是根梅娘接应我来了。那时候，她四十多岁，平日里说话不多，接应到我时也没说话。没等我说句感谢的话，她就默默转身走开了。

接应过我的还有金根哥，他是我的邻居。那是在一年的盛夏季节，上下屋的七八个社员结伴去几十里外的水吼深山里砍豇豆插子。到了山场，大伙便散落在山间“各自为战”。我是第一次进山干这活儿，只要肯出力，砍倒不是难事，只是不会捆扎，那用来捆绑的葛藤，在我的手中怎么也不听使唤。山路又陡又窄，砍下的插子有一人多高，必须用一种叫撑篙的扁担竖起来挑，否则没法通过。太阳偏西了，眼看着同伴都起身下山，我还在那里埋头鼓捣着，却怎么也捆不起来，急得一身是汗。爬上一座山坳，金根哥四下张望，发现我还没有上来，连忙歇下肩上的担子，回过头来接我，手脚麻利地帮我捆好插子。这一下，我挑起来轻松自如，很快跟上了伴。

金根哥作古多年，根梅娘还健在，前不久回去看她，96岁的老人，耳不聋眼不花，身子骨还硬朗。不用说，他们都是极普通的乡邻，而给我的帮助却是极不普通的。正是因了他们的接应，使得我不至于在众人面前出丑、孤独乃至绝望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和接应，但庆幸和感激之情，似乎都没有超过当年他们割稻、砍豇豆插子时接应我的那无声的一刻。

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，吮吸着田野上的露水长大，曾和乡亲们一起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“红汗淌黑汗流”，在田间劳作不息。如今，我的年纪大了，常常久久站立在都市寓所的阳台上，让目光透过黄昏时分苍茫的远空，去寻觅那些曾经接应、扶助我的父老乡亲，追怀那段情感园地的痕迹。

对于那时候农村的孩子来说，暑假作业就是到生产队里参加“双抢”。我当年十几岁，干的农活最多的就是和女社员们一起割早稻，队里每天给我记三分八厘工。因为母亲插秧是一把好手，队长总是分配她和男社员一起插秧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不能在母亲身边干活，得不到她的照料了。

一块大田，二十几个人一字儿排开，根据工分的高低，确定每人割的株数，我必须割六棵稻。面对一望无垠的稻田，妇女队长大声说，割不到头，不歇伙！就是说，你割不到田埂尽头，不准休息。

按照庄稼人的说法，割稻有技巧，也有标准姿势，腰弯到什么程度，手中的镰刀挥到什么角度，在稻秆何处下刀，都有讲究，要会使巧劲。在我看来，割稻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劳动。下了田，我蹲下身去，右手握住镰刀，左手揽着稻子，镰刀贴着地面，端平，镰刀使劲一拽，“沙沙——”稻秆立刻从底和根分离。“沙沙”，“沙沙沙”，还没到筋疲力尽时，苦和累一下子向我袭来。蹲在地上割的好处是腰不累，但腿又受不住，而且留下来的稻茬容易扎到你。各种姿势都无法适应，每一种都很痛，只有站起、弯腰、蹲下，不断变换动